

## 外国文学翻译体例的时代演变 ——基于《瓦尔登湖》不同译本的比较

吴巴英<sup>1</sup>, 李靖<sup>2</sup>

(1. 云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云南 昆明 650500; 2. 浙江大学 外国语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58)

**摘要:** 对比了《瓦尔登湖》的三个代表性译本: 1982年的徐迟译本、1996年的许崇信译本与2006年的戴欢译本。徐译尽量忠实于源语和源文化, 力图保证目标读者能理解新鲜的异域事物和概念; 戴译通过精短的前言、大肆改动后的目录以及段落结构, 使译作浅显易懂; 许崇信对译本体例的调整则介于前两者之间。总体而言, 三篇译文编排体例的前后各异, 折射出我国外国文学翻译策略上的异化减弱、归化增强的悄然变化。

**关键词:** 《瓦尔登湖》; 译本体例; 异化; 归化

中图分类号: I04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2013(2011)01-0083-05

### Evolution of the translation layout of foreign literature: Based on different translations of *Walden*

WU Si-ying<sup>1</sup>, LI Jing<sup>2</sup>

(1.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650500, China; 2.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i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layout of the three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Walden* — Xu Chi's translation in 1982, Xu Chongxin's in 1996 and Dai Huan's in 2006. It reveals that with the deepening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the translators gradually change their strategy from foreignization to domestication. Seeking the cause, the author of this paper deems that a reasonable explanation can be offered by the polysystem theory, which holds that the position occupied by translated literature in the literary polysystem conditions the translator in his choice of translation strategy.

**Key words:** *Walden*; translation layout; foreignization; domestication

《瓦尔登湖》(或《林中生活》), 首次出版于1854年, 是美国超验主义作家 Henry David Thoreau 的著作。该书记录了作者在瓦尔登湖畔的两年独居生活, 以深刻的超验主义哲思和清新的文笔著称, 是美国文学历史上最伟大的著作之一。1949年, 徐迟首度将《瓦尔登湖》译介给我国读者。近些年, 由于生态环境急剧恶化, 全球生态环境意识日益增长, 生态文学得到推崇。宣扬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瓦尔登湖》受到环保主义人士和普通读者的追捧。最近十几年里, 它不断被重译、再版, 所知的中译本不下 20 种。笔者认为, 其中具有很大社会

反响的有以下三种:

作为我国家喻户晓的一位作家, 徐迟是将《瓦尔登湖》译成中文的第一人。他的第一个译本名为《华尔腾》, 早在 1949 年就在上海出版问世。然而, “其时正值全国人民欢庆解放, 举国上下热气腾腾之际, 因此注意这本译著的人很少。”<sup>[1][12]</sup>而现在也难觅踪迹(这也正是笔者没选此版的原因)。1982 年徐迟在此版的基础上, “对全书进行了重新校译, 然后交上海译文出版社再版。书名正式定为《瓦尔登湖》, 译者补写了一篇《译后记》。新时期以来的知识界和少数读者对于梭罗和瓦尔登湖的了解, 大都通过这一版。”<sup>[1][13]</sup>之后徐译就不断再版。

许崇信是我国翻译界的一位著名学者, 曾担任中国译协理事、福建省译协副会长、福建省外国语

收稿日期: 2011-01-07

作者简介: 吴巴英(1984—), 女, 湖南浏阳人, 助教, 硕士, 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

言文学学会副会长等职。<sup>[2]54</sup>他和林本椿合译的《瓦尔登湖》于1996年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出版。其中，前13章由许崇信翻译，其余由林本椿翻译，从研究的一致性考虑，本文仅探讨前13章。

与前两位译者相比，戴欢或许还不甚为人熟知。他曾于20世纪90年代早期下海经营一家书店，期间，他接触到书籍市场营销。戴译印刷精美，于2003年由当代世界出版社出版，很快成为畅销书。到2004年2月，销量已超过60 000册。<sup>[3]</sup>网上一番搜索之后，笔者发现戴译颇受网友好评。由于热销，当代世界出版社之后还多次再版。本文选取的是2006年版。

基于这三种译作代表的不同时代特色，笔者选取1982年的徐迟译本、1996年的许崇信译本与2006年的戴欢译本这三个风格迥异又颇具影响力的译本进行对比分析，以从它们体例的演变中管窥到我国改革开放后外国文学的翻译及引进在方法策略上发生的种种变化。

### 一、对译后记或前言的处理

徐译有很长一篇《译后记》，对梭罗做了详尽介绍，涉及到他的出生、家乡、经历、朋友、著作、政治信仰和他的辞世，重点突出了他在瓦尔登湖畔进行的生活实验及其成果——《瓦尔登湖》。徐迟力图对梭罗进行全方位介绍，生怕遗漏半点信息。值得一提的是，徐迟还与读者分享了他的个人阅读体会：

本书十分精深，不是一般的读物。在白昼的繁忙生活中，我有时候还读不进去，似乎我异常喜爱的这本书忽然又不那么可爱可喜了，似乎觉得它什么好处也没有，甚至弄得将信将疑起来。可是黄昏以后，心情渐渐寂寞和恬静下去，再读此书，则忽然又颇有味，而看的就是白天看不出好处辨不出味道的章节……读书确乎需要一个幽静良好的环境，尤其读好书，需要的是能够高度集中的精神条件。读者最需要有一个朴素淡泊的心地。<sup>[4]313</sup>

徐迟似乎想通过后记现身说法向读者指明阅读此书的方法。

许译书后附有一年表，年表长达14页，记录了梭罗的生平大事。

戴译没有后记，却有一篇名为《致读者》的前言，十分简短，仅一页长。有关原作，只粗略谈及梭罗与《瓦尔登湖》在文坛上的地位及影响。与其说是在介绍原作，不如说是在为译作打广告。例如，戴欢说道：

亨利·戴维·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 1817-1862)在19世纪美国文化巨匠中，堪称一位“异人”……《瓦尔登湖》与《圣经》诸书一同被美国国会图书馆评为“塑造读者的25本书”。在当代美国，它是读者最多的散文经典……它也影响了托尔斯泰、圣雄甘地等人，从而改写了一些民族和国家的命运。<sup>[5]1</sup>

为什么三位译者会对译后记或前言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呢？笔者认为，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不同的时代背景造成的。20世纪80年代初期，国门刚刚打开，长期生活在信息闭塞环境中的国人对外国文学知之甚少。有鉴于此，作为将《瓦尔登湖》译介给中国读者的第一人，译者有必要对原作与原作者做详细介绍。从译后记不难看出，徐迟对目标读者的定位很准确，知道他们很少接触外国文学，要阅读《瓦尔登湖》这么一本旁征博引、蕴含超验主义哲思的著作必然会困难重重。为了让读者更好地体会书中的深刻含义，有必要对读者加以指点，因此他事先给读者打好预防针，告诉他们阅读此书需要幽静的环境和淡泊的心地。

当许崇信和戴欢翻译《瓦尔登湖》时，情形已大不一样。许崇信翻译此书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事，当时改革开放已开展15年多，大量外国文学作品涌入中国，相比徐迟的时代，读者对外国文学的了解大有增长。因此，一般情况下，译者不必再向读者推荐欣赏一本外国著作的方法。而当戴欢翻译《瓦尔登湖》时，已是本世纪初，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和交流更为密切。与徐译、许译重点介绍梭罗生平的做法不同，戴译凸显的是梭罗及其《瓦尔登湖》在文坛的地位及影响，试图吸引读者，这似归因于商业化对中国书市的影响以及戴欢在书籍市场营销行业的亲身经历。

## 二、对译本目录的处理

大致浏览一下三个译本的目录，就能发现戴译与其他两译差别很大。戴译的每一章都被划分为一些带标题的小节，这是原作以及其他两译都没有的。例如，第一章《简朴生活》(原作的“Economy”)就被划分为 32 小节，分别命名为《致本书的读者》、《无尽的苦役》、《人生的泥潭》、《经验不可恃》……戴欢本人在前言《致读者》中指出：“为了便于读者阅读和领略，我们在原有的各章内适当地提炼了新的标题。”<sup>[5]</sup>这种做法可以视为对原作的改写，体现了译者的主体性。

戴译目录的与众不同不仅体现在小节划分上，它还体现在用词上。翻译目录时，徐迟和许崇信主要采用直译，而戴欢常采用意译。下表是三个译本中的一些章节标题。

表 1 章节标题对照表

原作	徐译	许译	戴译
Economy	经济篇	经济篇	简朴生活
Solitude	寂寞	孤独	隐居林中
The Bean-Field	种豆	豆田	青青豆叶
The Village	村子	村子	村民
Baker Farm	倍克田庄	贝克农场	雨中田园
Brute Neighbors	禽兽为邻	禽兽为邻	邻居：野性难驯

对比以上标题，可以看出徐译和许译比戴译更忠于原文，戴译常常透露出译者主体性。例如翻译“Baker Farm”时，前两位译者均采用音译法，分别译为“倍克田庄”和“贝克农场”，而戴欢却意译为“雨中田园”，这一意象更为中国读者所熟悉，在目标文化中更容易被接受。又如，戴欢将“The Bean-Field”译为“青青豆叶”，叠词通常透露出亲昵之情，此处也不例外，加上“青青”一词，译文能更好地传达梭罗对豆田的喜爱之情，此处增益可谓锦上添花。而他将“Economy”和“Solitude”译成“简朴生活”和“隐居林中”，也都抓住了原文精髓，可谓“得意忘形”。总体而言，戴译比前两译更灵活，更倾向于采用归化策略。

然而，前两译并不是机械式翻译，它们也不乏灵活之处。以翻译“Brute Neighbor”为例，直译应该是“禽兽邻居”，一个名词短语。徐迟和许崇信都摆脱了原结构的束缚，将其转换成“主语+谓语”

结构——“禽兽为邻”。而此章重点是梭罗和他的动物邻居之间的和谐关系，而非动物本身，“禽兽为邻”刚好表达了这层关系。

戴译有时过于灵活，甚至可以说是随意，导致不少误译。将“The Village”译为“村民”就是误译。这一章主要讲述的是村子里发生的事情而不单单是村民们的事。正确的翻译应该是徐译和许译的“村子”。另一处误译是将“Brute Neighbors”译为“邻居：野性难驯”。如前文所述，这章强调的是梭罗和动物邻居间的和睦关系而非动物本身，戴欢却采用“主题+评论”的结构，突出了野生动物，忽略了梭罗。

## 三、对译本篇章段落的处理

上文提到戴欢将一章分成若干小节并辅以小标题的手法是对原作的改写，其实戴欢对原作的改写并不止于目录——而是贯穿全书。除将一章细分成若干小节外，戴欢还将一些段落分成若干小段，或是将一些段落组合为一大段。

将长段分成若干小段在戴译中数不胜数。以第一章为例：戴欢将第二段截为两段；将第三段截为两段；将第十八段截为三段；将第二十段截为五段……把若干段落组合为一段的例子比较少，笔者只找到一处，戴译 101 页，第二段的第五句实际上是原作中下一段的开头（见原作第 134 页）。不管是分割还是组合，戴欢此举显然旨在使译文浅显易懂，提高译本在目标读者群中的可接受性。

经他重组后基本上每一段都有一个独立的主题。例如，他将第一章的第二段分成两小段，而这两小段分别围绕不同话题展开。第一小段中，梭罗请求读者原谅自己暴露过多私事；第二小段中，梭罗为自己的写作特色——以第一人称说话——做辩护。如此划分有利于读者理清原作脉络。

戴欢重组篇章段落的动机值得肯定，但有时他会犯错，结果事与愿违。其中一例出现在戴译第 7 页《所谓生活必需品》一节。这一节第四段，前两句在讲动物的生活必需品，第三句也是本段最后一句却在谈论人类的生活必需品。而下一段，即第五段，讲的还是人类生活的必需品。其实，第四段的最后一句应归到第五段。

对篇章段落的重组在戴译中显而易见。徐迟和许崇信有没有重组段落呢?笔者带着这个疑问仔细阅读后发现:徐迟丝毫没改变原作的篇章段落,而许崇信对此稍有修改,例如,他将原作42页的一长段分成了两段(见许译第453页),但其修改频率远低于戴译。

对比三个译本的篇章段落,不难发现——徐迟严格遵循原作的篇章段落结构,而其他两位译者均对此做了一些调整。戴译有时甚至调整过度。从徐译,到许译,再到戴译,译者主体性日渐彰显,可以看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观念的变化,译者对原作的处理因应不同的时代背景,有了一些明显的个人主观色彩。

#### 四、对译本注释的处理

三个译本的区别还体现在对注释的不同处理方式上。徐译的所有注释均以脚注形式出现,印在被注释页底部。许译有少量脚注,但更多的是尾注,单独印在整本书最后几页,然而两者相加,总量也远少于徐译注释。而戴译,一个注释也没有。

本文选取三例,略作说明。

[例1] The twelve labors of Hercules were trifling in comparison with those which my neighbors have undertaken ...<sup>[6]2</sup>

(1) 赫拉克勒斯<sup>①</sup>从事的十二个苦役跟我的邻居所从事的苦役一比较,简直不算一回事,……

③: 希腊神话中的英雄,曾杀死纳米谷中的雄狮,九头兽,阿玛逊女王,三个身体的怪牛等。<sup>[4]2</sup>

(2) 赫拉克勒斯的12件苦差,和我邻居所做过的那些比较起来,简直是小事一桩,……<sup>[7]362</sup>

(3) 即使是希腊神话中的头号大英雄赫拉克勒斯受命从事的12件苦役,与我乡邻所承受的苦役相比,也是小菜一碟。……<sup>[5]2</sup>

例1中,徐迟在注释中介绍了赫拉克勒斯的故事,使目标读者明白为何梭罗要比较他邻居从事的苦役和赫拉克勒斯的苦役。美国人大都都熟谙赫拉克勒斯的故事,然而大多数中国人对此却是陌生的。有了这条注释,徐译能达到功能对等。许译没有注释,会让部分读者感到困惑。戴译加上修饰语“希腊神话中的头号大英雄”,巧妙地在正文中补

充了徐译注释中的信息。

[例2] It is said that Deucalion and Pyrrha created men by throwing stones over their heads behind them:

Inde genus durum sumus, experiensque laborum,

Et documenta damus qua simus origine nati.<sup>[6]3-4</sup>

(1) 据说,杜卡利盎和彼尔在创造人类时,是拿石头扔到背后去。<sup>①</sup>诗云:

Inde genus durum sumus, experiensque laborum,  
Et documenta damus qua simus origine nati.<sup>②</sup>

①据希腊神话,洪水以后,世上只剩杜卡利盎和彼尔他们两个人,于是神示意他们把母亲的骨骼从头顶扔到背后去。他们认为大地是万物之母,石头是母亲的骨骼,就照办了。每一块石头扔到背后都变成了人。

②拉丁文,从此人成为坚硬物种而历尽辛苦,给我们证明我们是什么来历。<sup>[4]4</sup>

(2) 据说,丢卡利翁和皮拉创造人类时是把石头从头顶扔向背后:

Inde genus durum sumus, experiensque laborum,  
Et documenta damus qua simus origine nati.

人从此变成坚硬的物种,艰苦备尝,

我们证明自己的渊源,来自何方。<sup>[7]363-364</sup>

译文(327、16-18)引自沃尔特·雷利爵士著《世界史》。<sup>[7]1184</sup>

(3) 据说,丢卡利翁和皮拉奉神谕将石头从头顶抛在他们的身后,又创造出了人类,有诗为证:

“从此人类成为坚韧之物,

历尽千辛万苦,

我们源自何处得以求证。”<sup>[5]3</sup>

例2中,中国读者一般不知道杜卡利盎和彼尔的故事,阅读许译和戴译就不免觉得不知所云。徐译有脚注提供这一信息,就不存在这种问题。许译此处的注释是尾注,属文献注释——注明原文出处的注释。事实上,通读完三本译著,笔者发现,许译多为文献注释,而徐译多为内容注释——提供读者可能感兴趣的信息的注释。

[例3] Self-emancipation even in the West Indian provinces of the fancy and imagination – what Wilberforce is there to bring that about?<sup>[6]5</sup>

(1) 要在西印度的州省中谈论心灵与想象的

自我解放，可没有一个威勃尔福司<sup>①</sup>来促进的呢。

①威勃尔福司(William Wilberforce, 1759—1833)，在英国殖民地从事解放奴隶的人道主义者。<sup>[4]6</sup>

(2) 甚至要在西印度诸省提倡想象力与创造力的自我解放——那么还需要威尔伯福斯\*在那边去实现什么呢？

\*威尔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 1759—1833)，英国政治家兼慈善家，主张废除奴隶贸易，废除英国海外属地的奴隶制。——译者注<sup>[7]366</sup>

(3) 即便在西印度的各州县中畅谈梦幻与想象的自我解放——可上哪去找奴隶解放者威勃尔福司来推动此事呢？<sup>[6]5</sup>

例3中，徐译和许译均提供了脚注介绍“Wilberforce”，而戴译在“威勃尔福司”前加上修饰语“奴隶解放者”，在正文中补充了其他两译的注释信息。

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由于篇幅所限，在此仅举三例。这些例子反映出三位译者处理注释的倾向：徐译最忠实于原文，试图保留原文风味，一有源语读者熟悉但目标读者陌生的信息，他就做脚注，且多为内容注释，补充目标读者不熟悉或者可能会感兴趣的信息。戴译最灵活，采取零注释法，个别情况下会采取增益手法，直接在正文中补充背景信息，但鉴于语言流畅等原因，不可能在正文中补充所有信息。许译的灵活度介于前两者之间，其注释远少于徐译，且多为文献注释。

三位译者处理注释的方式截然不同，其原因是：改革开放后，随着外国书籍、音乐、电影的涌入，以及互联网的普及，中国读者与外部世界的接触日益频繁，对外国文化的了解日益加深，对异域事物的接受能力越来越强，因此，译者向读者补充背景知识的必要性在降低。

## 五、小结

就译本体例而言，徐译主要采取异化策略，尽量忠实于源语和源文化：用一篇相当长的《译后记》，向目标读者介绍梭罗及其《瓦尔登湖》；没有更改原作目录；维持原段落结构不变；提供全面的注释，力图保证目标读者能理解新鲜的异域事物和

概念。戴译主要采取归化策略：精短的前言意在打广告推销译作，而非介绍原作及其作者；大肆改动原作的目录以及段落结构，使译作浅显易懂，易被中国读者接受；根本不做注释。许崇信介于前两者之间：译本附有梭罗的生平事迹表；没有改动原作目录；偶尔会调整原段落结构，以便读者阅读；向读者提供注释，但不如徐译全面。从徐译，到许译，再到戴译，明显呈现出异化减弱、归化增强的趋势。

究其原因，笔者认为Even-Zohar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提出的“多元系统论”可作为解释此种现象的理论注脚。他认为翻译文学在文学系统中占据的地位决定了译者对翻译策略的选择<sup>[8]47</sup>。具体到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来看，改革开放的实行应该是中国文学多元系统的一个转折点，翻译文学此时处于我国文学多元系统的中心位置，译者最有可能采取异化策略，为本国文学注入新鲜血液。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之前外国文学的真空逐渐被填充，转折点渐行渐远，翻译文学随之逐渐退向文学多元系统的边缘位置，译者倾向于采用归化策略，维持传统的甚至是过时的模型。

## 参考文献：

- [1] 徐鲁. 坎坷译路——徐迟的文学翻译生涯[J]. 中国作家, 1998(1): 104-113.
- [2] 许学征. 著作等身, 风范传世——忆我国著名翻译家许崇信先生[J]. 上海科技翻译, 2001(2): 54-56.
- [3] anmin0001. 《瓦尔登湖》与徐迟、海子、苇岸[EB/OL]. [http://xiaosanzi.blog.hexun.com/14805593\\_d.html](http://xiaosanzi.blog.hexun.com/14805593_d.html), 2004-02-25/2010-12-29.
- [4] 亨利·戴维·梭罗. 瓦尔登湖[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2.
- [5] 亨利·戴维·梭罗. 瓦尔登湖[M]. 北京: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6.
- [6] Thoreau, H. D. *Walden, or Life in the Woods*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 [7] 亨利·戴维·梭罗. 梭罗集[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6.
- [8] Even-Zohar, Itamar. The Position of Translated Literature within the Literary Polysystem[J]. *Poetics Today*, 1990(11): 45-51.

责任编辑: 曾凡盛